史学方法导论

傅斯年／撰

朱渊清／导读

蓬莱阁典藏系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史学方法导论

傅斯年／撰

朱渊清／导读

蓬莱阁典藏系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方法导论 / 傅斯年撰;朱渊清导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
(蓬莱阁典藏系列)
ISBN 978-7-5325-8922-7

Ⅰ.①史… Ⅱ.①傅… ②朱… Ⅲ.①史学—方法论
—中国—文集 Ⅳ.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4415 号

蓬莱阁典藏系列

史学方法导论

傅斯年 撰 朱渊清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市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地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5

字 数 142,000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922-7/K·2520

定 价 3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晚清民国，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旧传统与新思想无时不在激荡中融汇，学术也因而别开生面。士人的眼界既开，学殖又厚，遂有一批大师级学者与经典性著作涌现。这批大师级学者在大变局中深刻反思，跳出旧传统的窠臼，拥抱新思想的精粹，故其成就者大。本社以此时期的大师级学者经典性著作具有开创性，遂延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撰写导读，希冀借助今之专家，诠释昔之大师，以引导读者理解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等。是以本社编有“蓬莱阁丛书”，其意以为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取而为丛书名。“蓬莱阁丛书”推出后风行海内，为无数学子涉猎学术提供了阶梯。今推出“蓬莱阁典藏系列”，萃取“蓬莱阁丛书”之精华，希望大师的经典之作与专家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继续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大师的治学风范。

导读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朱渊清

傅斯年，1896 年出生，1950 年去世，仅仅活了 55 岁，但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学术组织者，傅斯年对现代社会的职业分工和道德有着清晰的认识和践履，[①] 他创办的史语所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路灯”和“指针”（陈槃语），在中国开创了现代的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并使这些学科迅速走向了国际。作为学者，傅斯年数目不多的论文，如《夷夏东西说》、《大东小东说》、《性命古训辨证》等掷地有声；他提出的“史学即史料学”是一种现代史学的方法理论，傅斯年反对传统，反对疏证，反对“史观”，强调科学精神、实证主义，提倡以史料为导向进入过去事实，主张史学研究应该从事考证和考古，而免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的干扰。傅斯年的史学方法理论

形成于创建史语所、发起殷墟和城子崖等考古发掘的实践活动，《史料论略》则是其史学方法理论的系统论述。

一、实践与思想

傅斯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现代中国学术的开始。史语所并列历史学和语言学，是以德意志国家研究机构为模型设立的，当时的主事者蔡元培、朱家骅、傅斯年都曾留学德国，对德国科学研究体系充满敬意。朱家骅《纪念特刊序》说，傅斯年将历史与语言并列是受德国洪堡(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语言历史学派理论影响，并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许倬云探讨当时德国学术发展的方向及其背景，指出“为了解除天主教会的普世秩序，德国学者孜孜努力于建构一个日耳曼民族国家的工作，用实证史学建立俗世历史与民族历史，用语言学确认日耳曼语系的周延，用神话与民族研究追溯日耳曼民族的渊源。凡此学科的工作，当时似乎没有具体的协调，却是齐头并进，集聚学术的力量，建构了‘德意志精神’的理念，由此发展出德国人强烈、浓厚的民族主义”。②

傅斯年创建史语所将历史与语言并列，还有对法国汉学成功经验的继承。顾颉刚晚年回忆，“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

尘,且与之角胜”。五四时期西方汉学尤其是法国汉学研究给了中国学人深刻的影响。北大《国学季刊》发刊时刊登了伯希和(Paul Pelliot)1911 年就任法兰西中亚历史考古学讲座时的讲演辞《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伯希和指出,由于古物学和古语学的复兴改变了原来中亚史研究仅仅根据文献典籍的状况,因此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篇演讲辞是王国维在 1919 年翻译的,王国维称此文“实举近年东方语学文学史学研究之成绩,而以一篇括之”。傅斯年对伯希和和另一位巴黎学派代表人物、瑞典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十分敬佩,为汉学取得的成绩所激励,他立意要建立“东方学”以取代“国学”和“汉学”,要使中国成为“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

傅斯年在留学归来之时,就有联结语言和历史两门学科的学术理想,欲以文献考据与语言学研究为历史学研究之共同基础,寄希望振兴历史学以抗衡西方日兴的汉学。1927 年 8 月,归国不久的傅斯年就在中山大学创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研究所周刊》的《发刊词》强调,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所有学问中成绩最丰富,应该承受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语言历史学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遗址中发掘,到各种的人间

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傅斯年很快就得以在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推行自己的理想。1928 年 1 月，傅斯年向蔡元培建议在中央研究院下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不久国民政府批准筹办。1928 年 9 月，傅就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0 月史语所在广州正式宣告成立。

1928 年 5 月，傅斯年撰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0 月该文以研究所筹备处名义刊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上。《旨趣》确定了史语所的工作方向、研究方法，也反映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概要。

在这篇宣言中，傅斯年首先指出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很近才在西方发达起来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他又说到产生于 18、19 世纪之交的语言学的发展，已蔚为大观。“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

这一个大题目。”然后他指出中国的历史学、语言学本来发达很早，但近代以来却落伍了。

傅斯年认为就建立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而言，判定学科进步的标准是：

1.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2. “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3. “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

据此三条标准，傅斯年提出：

1. “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就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

2. “扩张研究的材料”。

3. “扩张研究的工具”。并声明：(1) 反对国故。(2) 反对疏通。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就自然显明。(3) 反对普及。史语所是科学研究机构，用不着诱导别人爱好它。

1929年6月，史语所迁入北京。史语所成立初，分八个组（《旨趣》上拟分九组）：史料学组、汉语组、文籍校订组、民间文艺组、汉字组、考古学组、人类学名物组、敦煌材料研究组。1929年6月，合并保留三个组：历史组（第一组）、语言组（第二组）、考古组（第三组），后来又成立了人类学组（第四组）。史语所的创立，是“无中生有的志业”（杜正胜语）。在实证求真的科学精神引导下，史语所网罗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③] 短短20年，就享誉世界学林。到傅斯年去世为止，史语所共印行专刊30种，单刊25种，集刊22种，《史料丛书》7种，《中国考古报告集》2种，《人类学集刊》2卷。《史语所研究集刊》最为学界所重，共发表论文448篇。

史语所语言组以现代语言学彻底替代了传统的小学。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本来只是“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只能说是语文学（philology），而不是语言学（linguistics）。[④] 一直到民国初年，章黄学派的研究始终还是囿于《成均图》、“一声之转”的旧方法中。傅斯年对这种旧学作了尖锐批评，批评章太炎在文字学以外不过是个文人；而在文字学以内，章太炎不仅不如研究甲文的孙诒让、研究金文的吴大澂，甚至不如阮元。因为章太炎不仅自己不使用新材料，还抹杀别人使用新材料。李方桂后来承认他的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究起始于实在看不过章黄学派那种不科学的研究方法。[5] 傅斯年对语言学有这样的识见，是因他在柏林期间对梵文、藏文、缅甸文等下过功夫。[6] 傅斯年认为语言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境内的各种语言，他开列史语所语言研究对象包括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语言组在赵元任、李方桂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语言和方言调查，对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进行了全省性的汉语方言调查，对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的僮侗语、苗瑶语、藏缅语等少数民族和其他语言进行了调查。并在南京北极阁建立了语言实验室。比较语言学在非汉语研究方面成就最为显著，不仅成就远超清儒，且在国际上可比肩高本汉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在藏文、西夏文、汉藏比较领域成绩显著。在侗台语方面，李方桂是开创者和集大成者。赵元任、李方桂还开启了中国结构主义语言研究方法。[7] 傅斯年本人尤其重视语言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虽然没有能够完成对语言学、历史学之间关系的论证，但是他的《性命古训辨证》是一种可贵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还只能局限于思想史，实际上还是乾嘉皖派训诂的延续。

傅斯年要把史料学做成史学的“中央主题”，傅斯年将史语所同道称为中国的兰克学派。史语所强调新史料的开掘和利用，极

度重视原始资料，对于原始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不遗余力。李济说，傅斯年告诉史语所同仁一个原则就是找新材料，大家始终坚持这条原则。傅斯年的口号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李济回忆，史语所最初创办的时期，傅斯年全力鼓吹并奖励在所的工作人员扩张研究的材料，他的两句脍炙人口的标语初看是漫无限制的，不知由何处开步，从何处着手，不过在很短的时间，他就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的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二十年来的工作充分地证实了作这些决定的远见。在他的号召和指导下，史语所抢救收集了大批濒危的文献历史资料，发掘了众多珍贵的地下历史材料，开创了一代学术的新风。

史语所处置材料则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整理资料时排除任何主观的影响，重视对各种史料的校勘比对。历史组的工作重心是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和整理校勘《明实录》。清内阁大库档案是清政府藏于内阁大库中的明末至清代的诏令、奏章、则例、贺表、案卷、实录、殿试卷和各种册簿等。[⑧] 1929 年 9 月，傅斯年筹划组织"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历史组在清理、分类、编目的同时，还刊布印行《明清史料》。傅斯年在与吴丰培等人商议后决定史语所历史组着手《明实录》校勘整理工作，[⑨] 傅斯

年参与校勘《太祖实录》38卷。此外，史语所购得金石拓片25 000多张，33 800多卷；刘半农继续搜集俗曲本子和敦煌卷子；劳榦则对汉晋竹简，尤其是居延汉简进行整理。

史语所最大的成绩就是殷墟发掘。1899年起在河南安阳地区出土的有字甲骨吸引了罗振玉、王国维等参与研究。仰韶村遗址出土的陶制鼎、鬲使中国的历史学家和金石学家们认识到田野考古确是研究中国古物的关键。傅斯年对于西方地质学、考古学有认识，他的观点显然高明，在傅斯年看来，金石学家手中的古器物因为离开了它们的地层，其科学性、可靠性就降低，金石家所注意的只有刻辞铭文，就限制了考古学的范围。现代考古学应该去古遗址实地发掘，要把古人活动的所有遗迹都囊括在研究范围中。1929年，在殷墟发掘开始时傅斯年就作《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对殷墟地层进行了分析，指出除了器物，人骨测定、房屋、铜器模型、安葬方法都值得研究。傅斯年认为，考古学是研究古史最好的入手方法，考古学的价值在于文化的意义。[10]

1928年5月，傅斯年代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立刻就派董作宾去出土甲骨卜辞的安阳进行调查，并最终选定发掘安阳殷墟。同年10月，董作宾进行了安阳第一次发掘。1929年春，李济开始主持对安阳的第二次发掘，董作宾协助参加。董

作宾通过对甲骨刻辞及甲骨出土坑位以及共出的遗迹、遗物状况的研究，认定《竹书纪年》相关记载完全正确，小屯一带作为盘庚到帝辛的晚商都城从此被确定下来。从 1928 年 10 月开始到 1937 年夏，考古组共对安阳殷墟进行 15 次发掘，总面积 46 000 余平方米，其中 12 次是对小屯一带的发掘，3 次是对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区的发掘，另发掘洹水西岸的范家庄等遗址 12 次。在小屯北地有 53 座宫殿基址出土，其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甲骨，尤以乙十二基址旁埋葬着 17 096 片刻字甲骨的 YH127 坑最为出名。小屯村北约 1 公里处的武官村、侯家庄北地出土了商代王陵区，包括 10 座大墓及一千多座祭祀坑。梁思永在小屯村东南约 1 公里处高楼庄后岗的发掘中确认了仰韶、龙山和小屯三种文化层的叠压关系，解决了华北地区这三种古文化的相对年代。后岗还出土了殷代大墓。殷墟其他地区，如大司空村等地出土了一批殷代墓葬。殷墟发掘和李济主编的《安阳发掘报告》，对中国考古学的意义在于：第一，首创地层学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第二，首创陶器定名以及遗物的分类研究。第三，首创考古专题研究。第四，首创田野考古作业制度。基本确立了一套完整的田野考古作业的法则。[11]

考古组 1930 年转向发掘山东章丘城子崖，该项目也出于傅

斯年的倡议和组织。傅斯年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的，起源多处并相互影响，所以想在文献资料之外，通过田野考古找到直接可靠的证据。殷墟发掘之外，考古组先后组织山东古迹研究会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滕县安上村、曹王墓、王坟峪，日照县王屋村、大孤堆发掘，还组织河南省古迹研究会发掘浚县刘庄、大赉店，辉县琉璃阁、毡匠片，巩县塌坡、马峪沟等多处遗址。另外，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名义下，史语所还勘测了李三孤堆楚墓并调查了淮河流域多个遗址，董作宾、梁思永、石璋如还指导了浙江杭县良渚镇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傅斯年不是考古学家，但对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及其定位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考古学从开创伊始就形成了鲜明的历史研究的特色和风格。傅斯年在殷墟发掘之初所作演讲中指出："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在史学当中是一个独异的部分"。为历史的考古学实际上更是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念和取向，这种理念和取向根源于这块土地上悠久传承的丰富文化和历史知识的积淀，强烈的活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始终支撑着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

中国考古学的出现和现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运动有关。有些外国学者将仰韶文化彩陶的源头向近东文明方向去追溯，中国学者则更重视中华民族文化的本源。山东城子崖的发掘就是民族

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当时的学者迫切地希望找到仰韶和安阳之间的文化缺环。城子崖出土的黑陶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彩陶，证明了本民族独立的文化渊源。1954 年，针对 C. W. Bishop 的研究结论“中国早期的文化，不是来自西方，就是来自北方，没有任何成分是中国人自己发明、发展的”，[12] 李济发表题为《中国上古史重建工作及其问题》的讲演，总结殷墟考古成就，指出除甲骨文字以外，用烧裂的骨头占卜、养蚕和某些特定的装饰风格都是起源于中国的文化，“这三件东西，整个来看，代表一种自成一个单位、具有本体的文化”。

通过创办史语所、倡导殷墟发掘的实践活动，傅斯年进一步将《旨趣》中的一些思想予以理论提升，《史料论略》是傅斯年史学方法理论的充分阐释和总结。[13]“史学即史料学”标志了中国现代史学方法理论的建立。

史学是史料学的思想方法，实际上就是历史学近代科学化的标志。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 Momigliano）说：“历史研究的整套近代方法，奠基于原始史料与转手史料的划分此疆彼界。所谓原始史料，为目击者的陈述、文献（documents）以及实事自身的遗存，数者皆与事件同时。所谓转手史料，为史学家或编年家论述彼等所未及亲见的事件，仅凭传闻或直接或间接的参稽原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